

#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8届年会综述

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8届年会”于2020年10月1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程恩富致开幕词。会议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经济衰退加剧,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即将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等一系列背景下召开的。年会围绕理论经济学与中外经济发展、正确认识和高效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专题展开讨论。现将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 一、理论经济学与中外经济发展

本届年会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在理论经济学视阈下阐释中外经济发展,其中尤以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读中外经济发展的本质、现状及趋势的研究最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程恩富教授指出,班纳吉、迪弗洛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贫困本质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马克思从产权贫困、分配贫困、消费贫困、市场贫困、政策贫困、教育贫困、战争贫困、疾病贫困、精神贫困等多个维度关于资本主义贫困的论述,形成了“—体多辅”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确立了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经济、制度、政策、个体”四元贫困论,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贫困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余斌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差异,发展中国家要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产业结构选择上不能满足于在产业链低端建立的比较优势,必须努力进入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并牢牢掌握其核心技术,打破外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垄断。

广东财经大学方兴起教授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由机械制造时代带入智能制造时代,必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中国制造业目前总体来说还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内生变量,才能突破当前要素禀赋的瓶颈,实现产业基础高端化、产业链条现代化。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和理论渊源,由自主联合劳动、社本、需要价值构成的创新范畴体系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话语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分别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表现为剩余价值增长率总是大于名义GDP的增长率。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表现为劳动力价值的增长率总是等于相应时期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曲阜师范大学刘刚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以生态理念为普遍形态的高质量发展。

武汉大学龙斧教授针对中国宏观结构中消费内需不足和微观市场上房价过高的矛盾关系,根据“核心消费决定论”建立房价—工资、房价—储蓄、房价—零售价格三组关系构成的变量体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房价对储蓄和零售价格的因果作用关系十分明显,房价与工资、储蓄和零售价格的多元制约关系已形成中国发展模式中具有自身特性的常态化消费结构,不仅抑制中国家庭与居民的“日

常消费”“边际消费”，而且是中国消费内需不足的最大单个影响因素。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理论解读生态文明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字劳动等新经济形态等中国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多。河北师范大学刘刚强调，恩格斯的农村经济制度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发展历史进程中起着根本指导作用，应毫不动摇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内蒙古师范大学包秀琴认为，基于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探索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产生原因和人与自然和解的实现途径，对于丰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内蒙古财经大学赵秀丽教授探究了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的数字化关系，认为平台资本和数字劳动无疑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二者之间以各种复杂的方式联结起来，形成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的新型数字化关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宋树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规律有助于增进对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理解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政策分析。此外，与会学者还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维稳发展进行了探析，即分析如何保持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总量平衡，提出通过打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引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读国外经济发展的研讨主要有：山东大学刘文教授等分析了“东亚模式”概念的提出、内涵及其动态演化过程中质的变化与提升，认为“中国重心”型的东亚模式正在形成，未来伴随“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如何正确处理好老年人口的社会问题，开发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北京大学张杨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认为国家经济发展一方面应积极从出口依赖型向循环型经济体制转换，另一方面，应积极加强经济低增长情形下经济结构的调整。

## 二、正确认识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本届年会另一个关注点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向经济发展新战略转变的步伐。

关于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的意义，武汉大学龙斧教授认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是新国际形势下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点，也是中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更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

关于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的起源，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外循环为主”向“内循环为主”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变革的规律性要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外需大幅度下降、中美贸易摩擦等诸多外在因素更加凸显了战略转型的迫切性。因此，在“十四五”期间高效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对外必须调整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尽快运行和完善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结算系统，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实现由贸易顺差到贸易平衡再到略有逆差的过渡；禁止政府部门对外发行外币债券，禁止企业使用外币贷款和境外融资，实施“不对称全球化”新战略。对内启动国内大循环，四项措施非常必要和有效：将每年全国财政赤字率控制在至少5%以内，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以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实施就业保障计划，直接拉动消费；实施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恢复有关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政策，解决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伍山林教授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近代全球性大国双循环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加快我国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和建议：一是要以内循环为主体，充分利用内部竞争，发挥国内巨大经济潜能；二是要看重外循环对内循环的支持性作用，遵循平等与共赢的基本理念，构建包含对等原则的自由贸易体系，构建起能够促进内循环的外循环；三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独特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五更”式发展；四是要充分认识产业空心化的危害性，防止经济过度服务化

和金融化,抑制追求主权货币超然权力的冲动,助力双循环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程恩富教授提出,正确认识和高效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必要之举,也是纠正和修补过去过度的“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强调全面扩大开放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防风险、保安全;二是对等开放,这是开放的基本互利线;三是国民福利原则,这是开放的高层目标线。

### 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本届年会的再一个关注点是如何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会学者围绕完善中国特色国企治理机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一致认为只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才能够支撑国有经济和国家整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也要坚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农业大学罗玉辉认为,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改革在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四大要素的政策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还有学者剖析了国有企业“内嵌”精准扶贫战略的特色和亮点,指出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实现了公有制经济内部两种成分的良性互动。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国有企业经营方式市场化与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市场化。江苏理工学院李济广教授等认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对国有企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建立健全科学的国有企业董事会制度和董事长权能行使机制,是国企治理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必须体现公有制的特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民主管理。要科学处理党政关系,即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的关系。坚持民主管理首先要引导董事长正确发挥职能,党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发挥党组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保落实的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公司治理效应。内蒙古师范大学乔涵通过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现代公司治理,指出股份资本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在股份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逐步集中的过程中愈加激化和加深,导致企业治理效应不足。西安交通大学范玉仙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通过不同所有制股份交叉,产生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国有企业来讲,“一股独大”既不利于企业 EVA 经济绩效的提升,也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应鼓励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这有利于盘活民营企业的低效资产,降低不必要的经营成本。北京工商大学周清杰教授认为,合规成本是企业正常运转过程中必须要付出的,而摩擦成本对于企业而言是多余的,因此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才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所在。

概言之,与会者达成如下共识:要高度重视斯蒂格利茨和皮凯蒂等西方经济学家的合理观点;要借鉴吸收国外经济学说有价值的观点,立足中国大地,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要科学评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并准确分类;要正确认识和高效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坚持全面扩大开放的三个原则:防风险、保安全,对等开放和国民福利原则。

(内蒙古师范大学 胡伟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刘志鹏)

(责任编辑:谭易)

(校对:孙志超)